



# 尼克松回忆录

下 册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商 务 印 书 馆

# 尼克松回忆录

下 册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马亮生、翟一我、杨 德 译

董乐山、郑文华、黄雨石 校

商务印书馆

1967年9月北京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Grosset & Dunlap  
A Filmways Company  
Publishers • New York  
1978

**尼克松回忆录**

下 册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马究生、翟一我、杨 德 译  
董乐山、郑文华、黄雨石 校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5 1/4 印张 360 千字  
1979 年 3 月初版 197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3,000 册  
统一书号: 3017·238 定价: 1.40 元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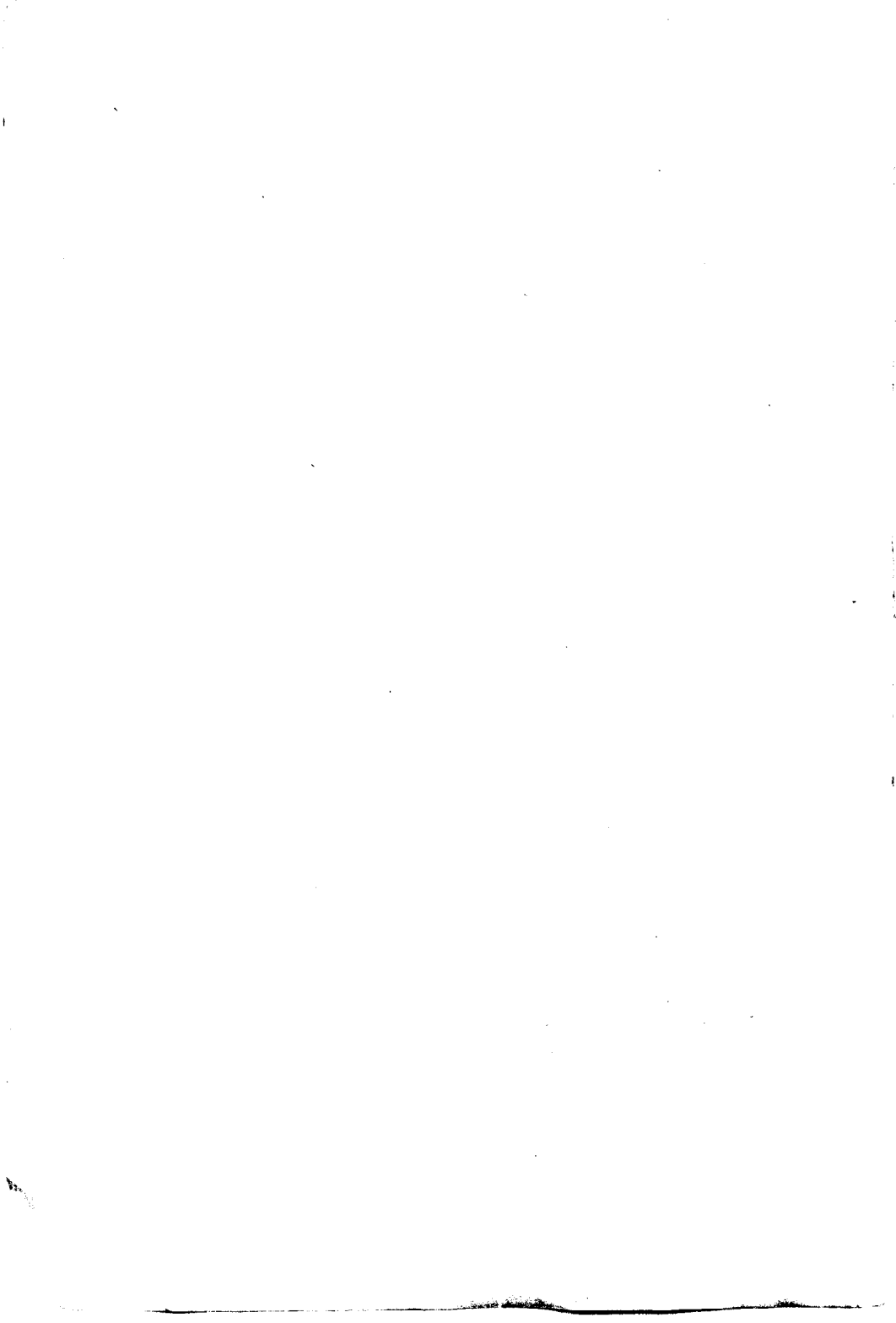
总统职位 1973—1974 年 .....	1
索 引 .....	433

210569/23

34249

# 总统职位

1973—1974年



就在1972年大选前不久，我有一次接见记者时说，在今后的四年中，我的这届政府将以主张进行1932年罗斯福政府以来最有意义的改革的一届政府而著称。但是我所设想的改革跟“新政”的改革是迥然不同的。我对前来采访的《华盛顿明星报》记者加尼特·霍纳说：“罗斯福的改革导致华盛顿的权力越来越大。在那时，这或许是需要的……我们现在要着手进行的改革将是……把权力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改革，……这会使政府比较精简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会使政府更加强有力一些。一个臃肿不堪的政府毕竟是软弱的，在处理问题上是无力的。”大选后的第二天，我对白宫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说得更加简单干脆，“不存在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要把禁区打破”。

在我第二届任期开始时，国会、官僚机构、舆论界仍在配合一致地进行努力，要维护传统的东部自由派权势集团历经“新政”、“新边疆”、和“伟大的社会”延续下来一直到1973年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现在我计划要在全国实现“新多数”的较为保守的价值准则和信念，利用我的权力加强我的这场“新的美国革命”的实力。我在日记中写道：“这将使那个权势集团大吃一惊，但这是唯一的办法，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使我们能把政府置于控制之下，不使它变得如此庞大，以致会把个人完全淹没，破坏使美国制度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那种动力。”

在我第一届任期中，我按照更有效率的方针来改组或改革联邦政府的一切尝试，都遭到国会和政府官僚机构的抵制，他们联合

起来，决心不为所动。这一部分是由于两党党争的原因：民主党的机构当然要抵制共和党的总统。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我所提出的计划和纲领威胁到他们几十年来通过历届政府积累起来的根深蒂固的权力和特权。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得不默认这种现状，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我第一届任期中，国会不会进行任何重要的组织改革或自动地限制财政开支。但是，我在这一次选举中得到了占压倒优势的选民的委托，而且我知道我只有四年时间来施展我的抱负了，所以我计划迫使国会和联邦官僚机构公开站出来，在公众舆论面前，把他们的阻挠破坏和在花钱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等行为说清楚。

1973年1月31日，我在第二届任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这里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国会要抓权……但如果你要有权，你就必须负起责任来，而这届国会……在花钱的问题上是不负责任的。当然，困难在于国会代表着特殊的利益集团，因为我自己当过国会议员。”

在我第一届任期中，我还得同越来越抱敌意态度的舆论界作斗争。关于他们的权力和偏见，阿格纽说过一些击中要害的大实话，但我得按总统和舆论界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敌对关系这种表面的说法行事。不过，在我目前的第二届任期内，我打算让他们知道，我不会再毫无怨言地洗耳恭听他们带刺的话，或让他们的不负责任的权力不受到挑战。

我在1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越南问题和平解决时就毫不客气了。我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可能，克服了巨大的障碍，最后取得了光荣的和平。我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在写这句话时会感到不痛快。但事实就是这样，而且大部分美国人也认识到事实就是这样。”



到1976年立国二百周年那一年新总统当选时，我希望我已为美国开始建立起一个新的领导阶级，这个新的领导阶级的价值准则和抱负将能更真实地反映全国的要求。这不单纯是保守派的观点，帕特·莫伊尼汉在1969年曾忧心忡忡地写道：“大概从1840年以来，美国有文化的上层分子就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广大社会的价值准则和活动给否定掉了。”

我任总统的头四年中的所见所闻证实和加深了我对美国领导阶级所怀有的这种忧虑。在政治界、学术界、文艺界，甚至在工商界和宗教界，都盛行着一种很成功、很时髦的消极态度，依我看来，这反映出根本原因是他们丧失了意志，背离了传统的美国观点和态度。越南战争破坏了传统的爱国观念，从而使这个阶层得以完成其异化过程。 763

在我第一届任期内，我注视着这个恶疾不断发展和蔓延。我在舆论界看到这一点，他们把造反的学生捧为英雄，对那些坚持传统价值准则的人，要么加以忽视，要么就把这些人说成是孤陋寡闻，或思想不开通。1970年帕特·莫伊尼汉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应该有个人出来指出这种倾向：当一个出身中上阶级的东部名牌大学学生说了句特别荒唐的话时，美国官方就得认为‘他是向我们进忠言’；但当一个年轻的建筑工人针对这种荒唐的话发表点什么看法时，我们便得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新法西斯分子，必须把他的嘴封住。”

在自由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界人士中则弥漫着一种比较微妙的态度，我在这里也看到了这一点。这种态度好象并不那么重要，但我认为这不等于说这种态度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担心。举例说，在竞选期间，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戴维营看的一部电影中就有一些镜头使我感到很烦恼。

## 日记

昨晚，我们看了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片名叫《人》。这部电影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影片中的那位国务卿的上衣翻领上别上一面美国国旗，而这个国务卿当然是被描写成为一个很坏的人物。霍尔德曼对我说，他看过一部叫《候选人》的电影，在这个电影中，他们也在那位共和党候选人身上别上一面美国国旗。我对霍尔德曼说，从现在起，我也要别上一面美国国旗，就是天塌下来我也照办不误。他说，麦格雷格从现在起就要让大家都知道，总统既然别上一面美国国旗，他们中间许多人也可能这样做，以表示他们对总统和国家的支持。当然，这样做时要注意，不要使人感到，你是在有意让人怀疑某些人的爱国主义，而这些人是你的对立面。人们竟然会这样糟塌我们的国家，这真使人感到奇怪。

这不是我出自于政治动机的一种偏见。我感到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我从阅读历史书中领会到：当一个国家的所有领导机构都由于自己怀疑自己和犹豫不决而瘫痪时，除非把这些机构加以改革，替换或甩开，否则这个国家将无法长期存在下去。在我第二届任期中，我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这三个办法中间的不论哪一种方法，或者这三个办法不论哪种形式的结合。

764 我认为美国需要一种积极自豪的新意识和新精神。现在越南战争既已结束，我感到我在创造这种意识和精神方面就能有所为了。我感到美国人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主要以中西部、西部和南部为基地，从来就没有人鼓励过他们，在控制国家的关键机构方面同东部自由派上层分子作一番有力的竞争。

鉴于即将袭击我和我的政府并使我的总统任期提前结束的丑闻，这看来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在1973年刚开始的头几个月

里，我正在计划让美国有一个积极的领导榜样，当然，我也希望是个令人鼓舞的榜样，这个榜样会成为重新产生乐观主义、决断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和动力。

在我第二届任期内，我想要在三个主要领域进行改革。我要改革预算，停止那些浪费而且无效的计划，并计划大规模改组和精简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和白宫工作人员。正如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后来所说的那样：“尼克松所想做的是实际上把政府管起来，这是七十年来哪一个总统也没有试图做过的事。”最后，我打算按照“新多数”的方针重振共和党。这样的一些改革会激起官僚机构和国会什么样的反应，舆论界又将如何报道，对此我丝毫不抱幻想。但是我有准备、有决心，而且我认为我有能力为这些改革进行战斗，因为我相信这些改革是好事，并认为它们是最符合美国需要的事情。

1月11日，我在比斯坎岛的书房中案头记事册上，概括地记下了我的全部希望和计划。这本来要成为我第二届总统任期内的蓝图的。

大选前，我要求管理与预算局局长卡斯珀·温伯格和约翰·埃利希曼审查一下联邦赠予计划。他们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一千多项计划中，至少有一百一十五项浪费很大。例如：联邦农业补助计划把百分之四十二的钱给了只占农民百分之七的最富裕的农民。另一个联邦计划仍在鼓励学生报考师范专业，尽管我们全国已有七万名过剩的教师，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尽管医院病床总数过剩，但我们还对修建医院进行补贴。总之，我1月29日送交国会的第二届任期的第一个联邦预算中所建议削减的预算支出将在1973年节约六十五亿美元，在1974年节约一百六十三亿美元。

削减这些计划是个大胆的建议，因为这些计划每年都得到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意味着成千上万的职位和政府合同。但我准备承受这个压力。艾琳·沙纳汉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老油子是从来不相信有人会真正下决心干一件事情的，而尼克松对待这些目标却这么认真，真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766

我们终于提出要改组、缩减或取消“伟大的社会”残余的那些庞大的计划——它们在帮助穷人方面什么事也没干，而目前主要是为执行计划的联邦官僚的利益服务的。在“经济机会局”的二十五亿元经费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钱还没有到穷人手里，便作为薪金和一般管理费用花光了。继续为这些不起作用的计划拨款，并不能为穷人服务。但我准备接受国会中那帮为穷人说话的人、自由派和舆论界必然要提出的指责——说我们提出削减的建议是冷酷无情，——不用等多久，果然这些指责就都来了。“尼克松总统的新预算使人们大吃一惊。这个新预算想要把他自己所笃信的劳动道德观念强加给我们整个社会。”约瑟夫·克拉夫特的原意是要批评我，但在我听起来，它却象音乐一样悦耳。

一年前，早在1972年1月24日，我就向国会提出请求对联邦开支定一个最高限额。由于国会只对另一项拨款计划进行投票，从来没有一个不超出总预算的方法，某些有价值的计划可能最终会造成政府赤字开支，然而，从来没有要众议员和参议员对此承担责任。因此这些立法人员们两面沾光。不论他们的良心、他们的选民和他们本党领袖要他们投票赞成什么花钱的议案，他们都可以这样投票，而又不必因为联邦赤字开支造成了通货膨胀和税收增加而挨骂。无庸赘言，对于取消这个舒服的特权，国会方面从来不是热心的，可是他们确也成立一个委员会要为控制预算提出新的办法。

1973年1月我又向国会要求不仅把1973年的开支限在二千

五百亿美元之内，而且要他们同意一直到1975年都要给开支规定一个极限。许多议员真诚而认真地关心将由谁来决定优先批准哪些开支项目，以及使用什么标准的问题。但有些其他议员则被这样的可能吓怕了：限制预算会影响他们再次当选的能力，因为他们竞选连任靠的就是他们能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多少联邦拨款。我对哪些计划需要优先批准拨款作了一番选择。现在要由国会来这样做了。一个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新的预算对各项计划和国会都提出了全面挑战，不仅只是感到意外而且引起了震惊、畏惧和愤怒……。有迹象表明，国会将团结在一起，捍卫被总统所褻渎的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正当我的预算和开支最高极限的建议在国会中引起阵阵震荡 787 时，我的改组政府的计划又在联邦官僚机构中引起了地震波，国会曾经扼杀了我1971年试图精简政府的尝试，所以我要求埃利希曼和新上任的预算局长罗伊·阿什成立一个工作组并跟宪法专家们一起研究一下，我可以独立进行哪些合法的改组。他们的意见是，我实际上可以凭行政权力，建立一个跟我1971年提出的改革建议非常接近的体系。

我们决定把内阁十一个部中的六个部和几百个联邦机构中的一部分机构组织起来置于四个总管理口之下：人力资源口；自然资源口；社会发展口；经济事务口。乔治·舒尔茨将主管经济事务口，再从现任内阁部长中选人分别担任其余三个总管理口的总统顾问。这些人对他们主管的所有计划直接对我负责。例如：在1972年，某一个由联邦政府提供经费的城市改建计划为了要买一项建筑器材就要经过七十一个人签字。为了雇用一个人，有时需要五个机构和五十六个人签字才行。有九个联邦政府的部或局和二十个其他机构都对教育计划负有责任。一个地方上的给水和排

水计划要牵涉到七个不同的机构。在我的改组计划中，主管各口的总统顾问将负责消除这种重复和无效率的现象。

我也宣布我再一次下决心要打破联邦政府对国家税收的钳制，而把有些税收归还给地方。从1960年到1970年，单纯赠予计划——这是指把联邦的钱交给地方和州政府从事各项工作，但仍受联邦官员控制和监督的计划——从四十四项增加到五百项。1969年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大政府对国家的威胁要比大企业或大劳工组织的威胁更大。我认为这种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1969、1970和1971年，我提出了体现税收分享原则的建议，根据这种原则，钱可以从联邦政府交回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那里，由它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轻重缓急来使用这些钱。1972年国会通过了税收分享计划，干脆规定把钱归还给地方，不受任何计划和项目的限制。在执行的第一年中，指定还给州和地方政府的钱达五十多亿美元。此外还有好几个特别税收分享计划，把钱归还给地方上时只有一项规定，这些钱必须用于范围有大致规定的计划：<sup>768</sup>如城市发展、执行法律、教育、职业训练、运输、农村发展等方面。特别税收分享计划本来可以取代困于繁文缛节中的一百二十五项单纯赠予计划。但迄今为止，国会没有通过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在1973年，我又提出其中的四个部分。

从实际上来说，税收分享计划是发挥地方管理能力和地方责任感的办法。从哲学上来说，它是四十年来联邦政府发展方向上的第一个大转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场新的美国革命。

从政治上来说，税收分享加剧了华盛顿的敌对情绪，因为它势必要废弃一部分官僚机构，而在这里，谁也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点权力和控制的。

大选后，我立即采取行动，大肆削减行政部门的人员。1969年我就任时，总统行政办公室人员达四千七百人。我们宣称，到1973年底我们计划削减百分之六十。我很遗憾，在第一届任期中，我们在一项基本工作上做得很差，而这项工作不论对哪一党的新任的政府都是最根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没有在各部和各机构的所有关键职位上都安插上忠实于总统和他的纲领的人。在这些由总统委派的职位上如果没有这种人员担任领导，总统休想动一动官僚机构。这对一个共和党的总统来说尤其是如此。而这点在几年以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中得到证实。研究人员乔尔·阿伯巴赫和伯特·罗克曼发现，在1970年，在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业官员中只有百分之十七是共和党人，百分之四十七是民主党人，百分之三十六是无党派人士。这些无党派人士常常是倾向于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的。研究报告的作者证实了我们对官僚机构所感到的失望是有其确凿原因的：“我们的研究结果是，职业官僚机构中共和党比例极少，而尤为突出的是，社会服务官僚机构中大多数管理人员在思想上对尼克松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内所遵行的方向是抱有敌意的。”伯纳德·门尼斯所作的另外一个研究报告集中研究外交官僚机构，他发现只有百分之五的外交官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

我决心不在这方面重蹈复辙。在我再次当选的第二天早上，我要求行政部门的每一个非职业雇员提出辞呈。大多数辞呈将不会获得批准，我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象征性的，表示现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在大选前的好几个星期里，我在读布莱克著的《迪斯累利》<sup>①</sup>一书时，我对迪斯累利形容格拉斯东<sup>②</sup>和他的内阁时所说的话印象很深，他说，他们是“死火山”。我宣称在我第二届任期

---

① 迪斯累利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首相。——译者

② 英国十九世纪的另一首相。——译者

769 内，我决不犯同样的毛病。我下决心不要象艾森豪威尔那样，在1956年以压倒优势重新当选以后，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毫无作为。我要我的内阁成员，尤其是新成员，感到他们完全有挑选他们第二届任期中的工作人员的自由。在有些情况下，我计划把白宫的工作人员调一些到内阁各部中去，以确保我们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只要是在我的权限之内，我决心要在第二届任期中打破东部集团对行政部门和联邦政府的控制。我建议向西部和中西部去找寻新的人。我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我要一个充满着1972年“新多数”精神的政府。我给他们明确了选用人员的四条标准：忠诚、宽厚、有创造性——和有胆略。我要任用工会领袖、妇女和在过去的政府中没有适当代表的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诸如波兰裔、意大利裔、墨西哥裔美国人等。

白宫全体工作人员和所有内阁成员都被要求提出辞呈。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一个错误。我没有估计到这一行动在那些在大选中出过力的人们中间会造成怎样令人寒心的影响，他们在大选中这么努力工作，自然希望有一个机会来好好地尝一尝巨大胜利的滋味，而现在却突如其来的反而倒要担心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了。这种情况由于我把自己关在戴维营里而更加严重了。在大选后的四个星期中，我在那里呆了十八天，与新、旧官员举行了四十多次会议，制订第二届任期计划。

民主党手中掌握了华盛顿的四张王牌——国会、官僚机构、舆论界的多数和在华盛顿幕后活动的一批令人生畏的律师和政治捐客——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反对党胆小怕事，这就等于又给了他们第五张王牌，那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我开始第二届任期时，我感到迫切需要重振共和党，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新多数。有好多天，我们甚至在议论成立一个新党。共和党仍然是有能力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拥有政治生活中一些最能干和有原则的男女人士。我觉得，我们最缺少的是没有那种能力，象一个多数党那样地来思考问题，敢冒风险，表示出象民主党那样单凭人多而有的那种自信心。对这点，我在竞选期间，在约翰·康纳利的牧场上举行的民主党人支持尼克松大会演讲以后就记了下来。

## 日记

我们就是需要我们方面有更多的人对于政治要象我们的 770  
许多民主党朋友那样热爱，他们似乎是极有那种感情的，正如我对康纳利所说的那样，共和党人比较内向，比较节制，比较循规蹈矩。民主党人什么都讲出来，喜欢大喊大笑，喜欢高高兴兴。共和党人也喜欢高高兴兴，但他们不让别人看到，而民主党人却在他们不那么高兴的时候也做出他们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我们做了各种计划来重建党的组织机构。我跟鲍勃·多尔，乔治·布什，克拉克·麦格雷戈，巴里·戈德华特，杰里·福特讨论了我们在1974年和1976年的全国竞选中获得最好候选人的办法。我感到，在展望我们的机会和前景时，我们都越来越激动；如果我们努力工作；又交好运的话，到1974年我们可能为二十年来的第一次由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奠定基础。

显而易见，国会决心要斗一下。康纳利向我报告说，国会山上的情绪是“我从未见过的那样有恶意。他们的脾气又乖戾又暴